

皖南发现的青铜剑纹饰及初步研究

朱华东¹ 管丹平²

(1.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2.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合肥 230061)

内容提要:皖南周代青铜剑纹饰资料详实、变化丰富。剑格主要有兽面纹、蟠螭纹与几何纹,剑首基本上为弦纹圈及几何纹饰。剑首、剑格纹饰与剑体其他部位特征演变规律类似,各期特征也较为显著,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研究表明,始自西周中晚期,设计者便注意到格、首在装饰上需要保持的平衡与协调,至春秋晚期该传统便达极致,其中剑格兽面纹的出现,是吴越青铜文化的一大改造与创新。而战国时期青铜剑纹饰的衰退则反映出吴越地区制剑审美观的转变。

关键词:皖南青铜剑 纹饰 类型 演变 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据调查,皖南地区各地共藏有周代青铜剑60余件,基本属于吴越剑系,年代最早可到西周时期,发展至春秋中晚期后达到了一个顶峰,数量也最大。这批资料为深入了解吴越系青铜剑,乃至是皖南地区青铜文明等问题均有着重要的作用。该批剑多数保存良好,我们也曾做过初步的整理和研究^[1]。但目前针对吴越剑的研究,多从整体出发,对其类型、年代、演变等基本问题探讨较多,发表的青铜剑材料也多忽视了对纹饰的介绍,此前也尚未见专门针对剑体纹饰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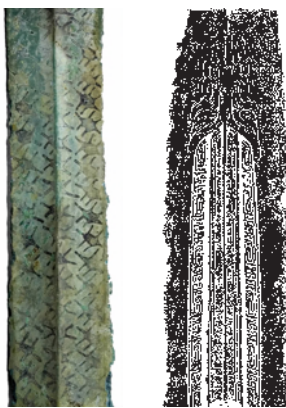
吴越系剑除了在选材、制作工艺及造型上较为考究外,在剑体上饰以造型精致的花纹及其配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特征,故探讨吴越剑纹饰的特征乃至其演化过程,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欲利用皖南这批材料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剑身纹饰

皖南发现的青铜剑纹饰主要存在于剑身、剑格和剑首之上。剑身上有用硫化技术加工而成的“暗纹”与铸造而成的纹饰两种。前者以在屯溪土墩墓出土剑(M8:1)^[2]、铜陵出土剑(编号

A188)^[3]及郎溪土墩墓(M4)出土的铜剑^[4]为代表,几把剑暗纹各具特色,均由疏密有间的不规则几何体构成。M8剑身为“黑色圆弧状暗斑”;郎溪剑则呈“几何形火焰状”,与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5]暗纹类似;铜陵剑纹饰也由一团状暗纹构成,每个雾团共有6个发散点(图一:1)。上述三件的剑型均为有格有首剑,剑茎上有两个圆箍,格、首也均有纹饰。

剑身上铸造而成的纹饰多分布于剑身后段,仅见于皖南屯溪M3出土一件(M3:010 1/2)。其纹饰以云雷纹为主,分两段分别饰于中凸的剑脊与两从之上。前段纹饰置于剑身中前部,为细线条勾勒出的以剑脊为轴对称的变形云纹,线条浅而细密。后段纹饰空间上可分两层:上层为凸出的中脊,上以脊线为轴,铸有细小的云纹;下层内凹,略低于两从,内饰云纹,大小不一,以一大三小、一横三竖的组合间隔排列。屯溪剑身上的纹饰形制及其组合方式,主辅结合、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立体感较强,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图一:2)。类似的纹饰剑在周边地区出土过几件,均为西



1 2
图一// 剑身纹饰
1.铜陵(A188)
2.屯溪(M3:010 1/2)

收稿日期 2010-09-06

作者简介 朱华东(1976~),男,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安徽区域考古。

管丹平(1982~),女,安徽省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安徽区域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项目(05BKG00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0sk063)以及安徽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资助。

周时期器物,纹饰类型及其组合方式与屯溪剑基本相同,但均为无格剑,剑身也更短小^[9]。这类剑身铸有纹饰的剑,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古越阁^[7]、浙江瓯海^[8]等地出土的匕首式无格短剑,与屯溪剑相比,纹饰类型及组合方式有较大差异。

二 剑格纹饰

剑格与剑首是吴越系剑的重要特征,其上也多有精美纹饰。此两处纹饰多存在于所谓的“厚格剑”^[9](铜陵A79,图二)之上,该类剑具有较阔的剑格和圆盘状剑首,其中格厚一般在1~2厘米之间,为纹饰的设计以及增添装饰物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剑首呈浅喇叭口状的圆盘形剑首,中心略凹,而周边较浅平且肉较阔,也为当时的工匠进行艺术创造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两个部位的纹饰往往同时出现,相映成趣,此乃吴越剑系外其他地区所少见。

根据剑身特征,可分两种类型:其一为普通剑身,带有两斜从,剑身剖面近似菱形,该式剑初见于屯溪土墩墓,可早至西周时期,皖南共出土9件,其中包括屯溪墓出土的5件;其二带有宽深的血槽,血槽内平面粗糙,似未经过后期打磨,剑身剖面呈状,形成并集中发现于春秋中晚期,皖南共发现13件。以第二类格、首部纹饰最为丰富,根据目前资料,以皖南、长兴、镇江发现较为集中,又以在皖南发现的数量最为丰富,占到该地所见青铜剑的33%,而且多为较完整器。而另一种在皖南及吴越地区常见的一字薄格剑,虽有圆盘状剑首,但却为素面。

皖南青铜剑剑格纹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动物纹,包括兽面纹和蟠螭纹。兽面纹格剑目前最为重要的资料当属屯溪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剑。其中M3发现的兽面格剑造型最为古朴,格两面均有纹饰,且基本相似。其兽面构图较抽象,通过简单的线条表现出兽的眼、鼻、角、爪等部位。两剑剑格纹饰略有不同,其中一件(M3:010 1/2)以两眼为主体,旁边辅以两道纹饰,似为兽的两爪,此类表现手法后期少见。剑格凹字形凸起较窄,且内卷明显,形成兽的两角(图三:1)。而M3出土的另一件剑(M3:010 2/2)构图则更为简洁,甚至略去了两旁的兽爪(图三:2)。值得注意的是此两剑中尚无兽口出现。屯溪M7剑(M7:1)格特征与M3剑基本一致,但眼侧无兽爪,在两眼中上方出现了一道“八”字纹,其间形成兽鼻(图三:3)。M8剑(M8:1)剑格纹饰及造型与前两剑有继承关系,开始出现



图二// 吴越系厚格剑
(铜陵A79)

了兽口(图三:4)。屯溪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在西周中晚期。自M8剑后,剑格构图基本确立,此后纹饰在细节上更加活泼,线条渐粗圆。铜陵A128剑属于春秋早期剑,其兽面纹则较为夸张,其口、鼻及一对重环纹的大眼,基本占据了全部空间,剑格呈现标准的凹字形,不像前期那样内卷(图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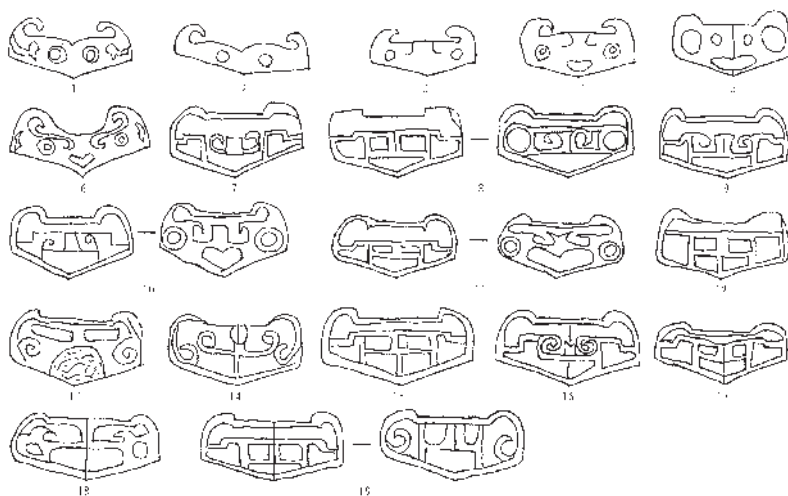
皖南地区发现的春秋晚期兽面纹格剑较多,除铜陵A188(图三:6)外,均为第二种类型的厚格剑,包括铜陵3件(编号分别为A79、A125、A127)、南陵8件(编号分别为013、014、015、016、018、057、064、070)、繁昌2件(编号为临7、临8)(图三:7~19)。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凹字形剑格高度渐低,宽度加长,两端略微前凸。格

上兽面纹嘴渐窄宽,兽眼多重环。但此期兽面纹与前期相比却有较大差异,开始出现利用若干组相连的细线条组合而成更为抽象的兽面纹,构图基本原理相似,但图案少有重复。多数剑两面纹饰各异,但基本组合为一面为减地线条构成的抽象兽面纹图,另一面兽面构图与前期兽面纹相似。此期可谓达到了青铜剑格兽面纹创作艺术的顶峰。

格饰蟠螭纹的剑例较少见。皖南以屯溪M4剑(M4:21)为代表^[10]。剑格两面均饰蟠螭纹,但锈蚀较重,仅残存部分纹饰,线条较细密,并勾连在一起,依稀仍可辨得(图五)。该剑属西周晚期剑。在江苏吴县^[11]也发现了1件,一面饰蟠螭纹,另一面为变形兽面纹,长兴12号与15号^[12]剑格也有蟠螭纹。这批剑纹饰与屯溪M4剑几乎一致,而剑型又属早中期剑型,其下限在春秋早期。

第二类为几何纹,以繁昌出土剑(编号1078)为代表(图四)。其一面为变形雷纹,由一根线条折绕而成,呈左右对称,充分利用了格部空间,构图饱满;另一面为对称的不规则方形凹坑,似为填置绿松石之类装饰物位置。此剑格纹样设计可谓别具匠心。其剑首外圈缺失,尚存部份未见纹饰。几何纹剑在吴越地区发现不多,且基本为早期剑型,如长兴1号匕首短剑,格两面及剑茎通饰云雷纹,且有繁简之分。但与繁昌剑纹饰类似造型的剑目前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

总之,皖南青铜剑格纹饰以兽面纹为主,其他纹饰少见,且多为早期剑。兽面纹始自西周中晚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由于相应剑型的衰退,本地剑格纹饰并未得到继续发展。其构图总体上由简单走向繁缛,同时也重视外在装饰,



图三// 剑格兽面纹

- 1.屯溪(M3:010 1/2) 2.屯溪(M3:010 2/2) 3.屯溪(M7:1) 4.屯溪(M8:1) 5.铜陵(A128) 6.铜陵(A188)
7.铜陵(A79) 8.铜陵(A125) 9.铜陵(A127) 10.南陵(O13) 11.南陵(O14) 12.南陵(O15) 13.南陵(O16)
14.南陵(O18) 15.南陵(O57) 16.南陵(O64) 17.南陵(O70) 18.繁昌临7 19.繁昌临8

剑格两面构图避免重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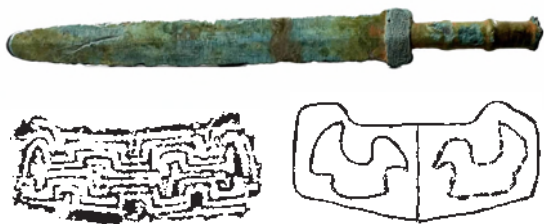
三 剑首纹饰

皖南青铜剑首部的纹饰也颇具特色,由于保存不佳,部分剑出土时剑首已缺失,其数量要少于剑格。一般情况下,格上铸有纹饰的青铜剑,在其首部往往也伴有花纹。其中早期以屯溪M3(图六:1、2)、M7(图六:3)剑为代表,多为简单的弦纹圈,或在其中一、两组间填有竖直的短线,在屯溪M8剑外圈间已出现了单组锯齿纹(图六:4)。这些特征均被后期剑首保留并融合创新。

根据皖南出土剑,首部纹饰至春秋晚期方才达到顶峰,其样式一改前期风格,变得较为繁缛,造型也相对规整稳定,并在同型剑上反复出现。此期纹饰可分为三型:

A型为弦纹圈内填竖线(铜陵A188,图六:5),造型较简单,保留有前期风格。该剑剑身装饰有暗纹,首部纹饰简单或许与此有关。

B型为弦纹圈内填数组锯齿纹,类似于太阳的放射状光芒,构图在两三道弦纹圈内完成。以南陵O13(图六:6)、南陵O16(图六:7)、南陵O57(图六:8)、南陵O70(图六:9)为代表。



图四// 繁昌 1078 号剑及剑格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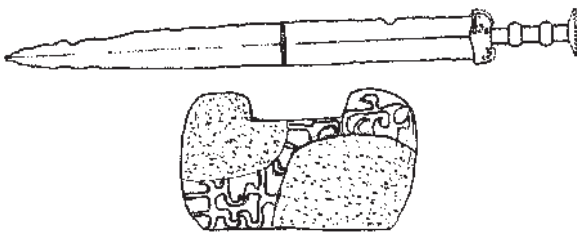
C型内填疏密不等的折线纹,由剑首中心放射而出。以铜陵A127(图六:10)、南陵O14(图六:11)、南陵O15(图六:12)、南陵O18(图六:13)、铜陵A79(图六:14)和繁昌临7为代表(图六:15)。

周边地区也曾出土部分剑首带纹饰的厚格剑,据现有材料看,以长兴和镇江^[4]材料最为集中,可惜图像不甚清晰。长兴出土的12件厚格剑中,首部纹饰类型均可归为皖南的三型中,并以数圈弦纹构成的纹饰为主。镇江6件厚格剑,仅有3件保留剑首,线图不清,据文字介绍多为“同心圆纹”。如究其来源,这些纹饰造型倒不见于吴越其它青铜器之上,其构图与本地商周遗址出土等印纹陶纹饰却有几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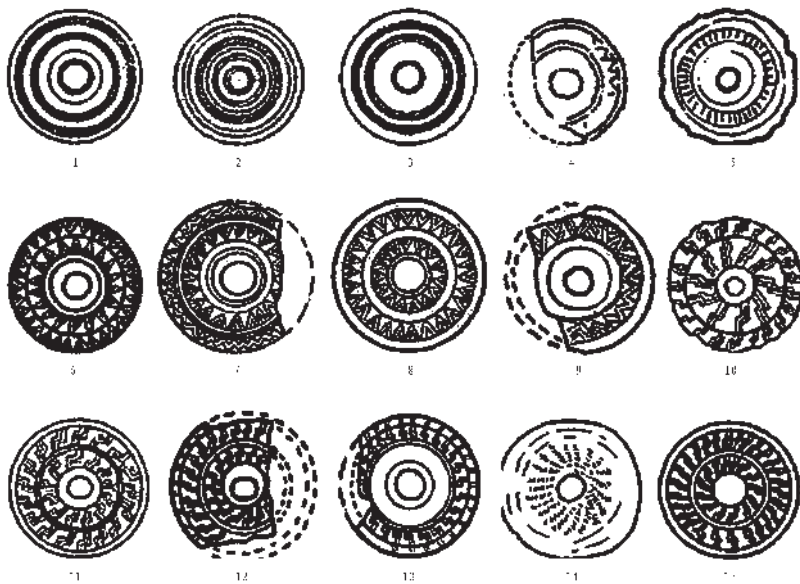
四 几点认识

由上述材料略谈我们几点粗浅的认识。

其一是以首、格纹饰为代表的皖南青铜剑纹饰的演变过程。吴越各期青铜剑剑首、剑格纹饰与剑体其他部位特征演变规律类似,各期特征也较为显著,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早中期剑首纹饰较单调,多为多圈的弦纹,变化也不明显。剑首的装饰仍处在次要位置,出现了带有素面剑首的兽面



图五// 屯溪四号墓剑(M4:21)及剑格纹饰



图六// 剑首纹饰

- 1.屯溪(M3:010 1/2) 2.屯溪(M3:010 2/2) 3.屯溪(M7:1) 4.屯溪(M8:1) 5.铜陵(A188) 6.南陵(O13) 7.南陵(O16)
8.南陵(O57) 9.南陵(O70) 10.铜陵(A127) 11.南陵(O14) 12.南陵(O15) 13.南陵(O18) 14.铜陵(A79) 15.繁昌临7

纹格剑,铜陵A128即为一例。但剑格纹饰略多,有云雷纹、蟠螭纹和兽面纹几类。其中兽面纹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早期构图较简略,不过已逐渐形成了兽面的眼、嘴、鼻、角等部位。早期剑身下部和剑茎通常满饰花纹,极为精致,因多为无格剑,而纹饰位置又居于剑体中段,在视觉上非常稳重平衡,这或许是早期青铜剑剑身纹饰流行的原因之一。屯溪M3共出土2件青铜剑,其中一件除保留了茎上的一对扉耳外,其它与后期的厚格剑造型基本一致,但剑身纹饰消失,说明在西周中晚期,剑身纹饰随着厚格的出现而逐渐衰落。

中晚期可分两阶段。早段为格、首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时格部基本为兽面纹,剑身和剑茎纹饰早已消失,仅保留箍上的云雷纹,但也很简略。这一时期尤其强调格与首的装饰,无论是兽面纹的造型的创新,还是首部繁缛纹饰的涌现,两个部位的装饰均处于同等地位。但从艺术创新的角度看,剑首纹饰的演进速度甚至要超过剑格。晚段为衰退期,剑体朴素化,部分剑首此段仅有数道弦纹,但与早期相异,弦纹变得更精细,间距细密。此后随着素面厚格圆茎剑的流行,这类纹饰剑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二是剑格上兽面纹的出现及其布局。从目前资料来看,格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兽面应该属屯溪M3所出剑,对此,上文已作讨论。这里首先关注兽面纹在青铜剑出现的意义。兽面纹饰是商周青铜器的主要纹饰之一,在商及西周时期的钺、

矛、戈等兵器上也曾发现有兽面,但各地早期青铜剑上还很少出现类似纹饰。吴越剑出现兽面纹是否借鉴过前者的创作思路,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两地的兽面却有着较大区别,前者属于青铜器常见纹饰,后者则变形较大。因此基于兽面纹饰在吴越地区深厚的历史渊源^[14]剑格上出现兽面纹乃是吴越青铜文化的一大改造与创新。此外,剑格兽面纹的造型也有明显的指向,有学者称之为“方向性”^[15]。制剑者利用剑格有限空间,合理布局兽面的各部位,使得兽面朝向剑身,兽口大开,兽眼狰狞,意令观者产生畏惧之感^[16]。

其三为艺术创造方面的启示。

首先是剑体诸纹饰的协调之美。厚剑格的存在,是剑首纹饰出现乃至复杂化的前提。厚格的存在使得青铜剑在实用和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协调。格上纹饰的复杂化,同时也带动了首部纹饰的再创作。可以说,这类主体特征形成于西周中晚期的厚格剑,从一开始,设计者便注意到两个部位在装饰上需要保持的平衡与协调,这种传统至春秋晚期便发展到了一种极致。

其次,首、格部纹饰的衰退反映了战国时期吴越地区制剑审美观的转变。早期的吴越系剑多重装饰,纹饰华美而丰富。其中屯溪墓厚格剑的出现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几百年间,这型剑造型并未发生过大的改变,尤其是格和首部纹饰从萌芽到成熟的轨迹十分清晰。前文通过材料已经论证过该类型青铜剑属于吴越

剑系的南方类型。对当地人来说,剑的装饰作用和作为武器的实用性同样重要。剑体主题纹饰的选择也有其独特的含义与文化渊源,首部纹饰则符合当地流行的几何纹构图方式,这些莫不体现出一种古朴之美,在这种审美观下创造的厚格剑被广泛接受并传播开来。但至迟自战国早期开始,该类剑开始逐渐被取代并消亡。尽管前后延续的两类剑在外形上有一定的演变关系,不过标志着前者主要特征的格、首纹饰却消失不见,格也渐窄。到了战国中晚期,这一新型剑在大半个中国普遍流行,而格首有纹饰的厚格剑却停止了发展,而仅有少量的子遗。这种骤然转变,我们认为与楚文化的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楚国尚武,重视对兵器的制造,更强调作为兵器的剑的实用性,其剑身加长,线条流畅,剑锷渐阔,锋利异常。可见楚文化剑美并不限于局部的装饰,而是将重点放在器物的实用性上,以整体线条突出一种流畅的美感。

- [1]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二十五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83页。
 [2]李国梁:《屯溪土墩墓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3页。
 [3]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4]宋永祥:《郎溪土墩墓初探》,安徽考古研究所编《文物研究》第2辑,黄山出版社1986年,第86页。

- [5]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6]这批无格剑包括长兴发现的2件(铜013与铜049)、温州瓯海土墩墓出土3件、浦城管九土墩墓出土5件。
 [7]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第4期。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9]此所谓“厚”是与薄格剑的“薄”相对应,指的是剑格在剑身与剑茎之间的长度。
 [10]屯溪M4剑纹饰在发掘报告中图像不可辨识,此次承蒙安徽省博物馆李治益先生厚意,得以目验该器,方得核实,谨致谢意。
 [11]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年第4期。
 [12]夏星南:《浙江长兴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1989年第1期。
 [13]肖梦龙:《镇江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4]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期最早出现兽面纹的地区之一,这里兽面的造型与商周时期兽面纹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在玉琮等器上,简化的兽面对兽眼放大夸张,显示出一副简单而不失狰狞的面孔,这种设计与吴越西周时期剑格上的兽面有颇多相似之处。
 [15]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第4期。
 [16]作为剑格的观者可分两类:一为砍杀之敌,攻击时兽面指向敌方,犹如猛虎下山之势,给攻击者以心理暗示的力量;二为一般的观者,当剑在鞘内时,剑格暴露在外,剑斜挂在腰间,以观者的角度视之,兽面指向藏匿于鞘内的长锋,会使观者产生敬畏之情,给予持剑者以威严之感。

Patterns on the Swords Unearthed in South Anhui and Initial Research

ZHU Hua-dong¹ GUAN Dan-ping²

(1、History Department of 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

2、Anhui Province Museum, Hefei,Anhui,230061)

Abstract: Abundant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concerning the patterns on the bronze swords of the Zhou Dynasty unearthed in South Anhui. The cross-guards are mainly patterned with Animal Mask, Pan Chi or geometric shapes, and the pommels are basically patterned with strings or geometric shapes. The patterns of pommels and cross-guards share similar rule of evolution with the other parts of a sword, both of which are marked by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and a certain matching relationship exist between. Research shows that since the mid-late Western Zhou, a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in decoration design between the pommel and the cross-guard of a sword had been pursued, which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imal Mask pattern being used in cross-guard decoratio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innovative reforms of the bronze culture of Wu & Yue States. The decline of the decoration art of bronze sword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esthetic view of sword making in Wu and Yue areas.

Key words: Swords of Southern Anhui; pattern; type; development; artistic character

(本文终校:王霞)